\*\* 对诗歌史的认识和梳理

:LOGBOOK:

CLOCK: [2020-12-07 Mon 21:10]--[2020-12-07 Mon 21:10] => 0:00

:END:

\*\*\*\* 日本汉诗人的分期意识

\*\*\*\*\* 中国诗歌史

日本汉诗人的分期意识首先来自于对中国诗歌、诗学文本的长期阅读。在此过程中，日本汉诗人也会注意到中国诗歌历史的变化，并对此加以总结。

日本汉诗人通常很重视《诗经》和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中的地位。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到，《诗经》作为中国诗歌史的开端，这在日本汉诗人的心目中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而唐代诗歌则是另一个高峰。而唐诗的影响也从日本汉诗的发轫期一直延续到了繁盛期，即江户时代。大儒林罗山曾说“李杜全集，到今家家有之。”（林罗山文集卷七十三，转引自 概论日本汉文学中的杜甫受容）再加上平安时期崇尚白诗，这些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唐代诗歌在日本受到的关注持续了很长时间。

而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宏观认识上，严羽的总结影响较大。三浦梅园《诗辙》卷二引《沧浪诗话》原文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日本诗话丛书，6，104）同时，《诗辙》一书还采《诗品》、《诗薮》等中国诗学经典，细探古体、近体诸体。

相较《诗辙》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认识沿用中国诗学传统的话语，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则以日本汉诗为基准，重构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为唐中宗嗣圣十四年，上距梁武帝天监元年，几二百年。弘仁天长 初唐天历应和，崇尚白并勉乎百年之后。五山诗学之盛，当明中世在彼，则李何王李，唱复古于前后。在此则南宋北元。专传播于一时。我元禄，距明嘉靖亦复二百年。则七子诗，当行于我邦，气运已符。”（46）以日中两国汉诗发展中的两百年距离为参照，江村北海构建了一条从梁武帝天监元年开始至当时清代的中国诗歌史。

除了以诗话为载体的论述，赖山阳等诗汉诗人也尝试用论诗诗的形式，对他们眼中的中国诗歌、诗学理念作出诗性的评价（近世东亚汉诗流变，403）。而这种以诗论诗的传统，从日本汉诗的发轫期就开始了。菅原道真就有论诗诗留世，而江户后期的折衷派诗人更长于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理解（亚洲汉文学，98）。可以认为，论诗诗在日本汉诗史的书写中是特殊的：它既为日本汉诗史的书写提供了值得关注的史料，呈现出日本汉诗人对中国诗歌传统的阅读史、接受史，又是泱泱日本汉诗经典中的一部分。

\*\*\*\*\* 日本汉诗人的诗史书写

\*\*\*\*\*\* 日本诗史书写与中国诗史书写的关系

在展开本部分之前，必须对“诗史”的概念作简要的介绍。“诗史”产生于中国诗学传统。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孟棨《本事诗》的概念，与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叙事有关；而自宋到清，诗家对这一概念的阐发也始终围绕着“诗史”叙事与抒情功能展开（张晖的《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257-267）。

而日本的诗史传统同中国的诗史书写有着相当的联系。而其核心关联在于对杜甫的推崇。市野迷庵（1765-1826）的《诗史颦》一书在进入近代后受到了诸多关注。以明治时期日本政治家柳原前光为代表的读者，对于“诗史”的理解，围绕着杜甫这一典范诗人，以及“诗史”记录时事的功能展开。具体来说，柳原前光认为：“古之詠史者，一言一詠，皆有所爲而作,故往往有詩史稱。後之作者，率不察當時情勢，慢然品評,赞之罵之，亦不過玩弄古今人物而已，豈詩史云乎？”（1678）又有汉学家市野光彦：“杜少陵，詩聖也，而有詩史之稱。”（1689）

为何推崇杜甫？除了因为杜甫是历代“诗史”观念的核心，还因为市野迷庵创作此书的动机。他有感于日本南北朝战乱时期价值观混乱、伦理无常，于是择其中南朝忠诚有义之士的诗史之作，以重新赋予本国南北争战时期与杜甫诗史所体现的家国思想相当的时代价值。

而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汉学家们重视此书的原因也在于此。虽然南北争战的结果以足利幕府支持北朝为胜利告终，但明治天皇亲自裁决，认定南朝为正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南北朝时期历史的重新构建，便成为明治政府书写新的国家记忆的必要环节。诗圣杜甫和他的诗史也在此过程中被视作价值的典范。

这些观点是近代日本诗、史、经三位一体思想中尊皇理念的集中体现。那么，诞生于江户时代的《日本诗史》便具有其特殊性。作为一部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诗话著作，江村北海的诗史书写尽管在品评诗人时也具有儒家诗教观念的痕迹，但从整体的体例上来说，它较完整地呈现了日本汉诗从奈良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的发展，同时也对当时京都、江户，乃至其他地区的诗人诗作作了全面的整理。

而对于该书的情况，论文第一章已有专文论述。这一部分将对日本汉诗人对本国诗歌发展史的思考进行梳理。

\*\*\*\*\*\* 对诗史源头的描述

首先，日本汉诗人关注本国汉诗传统的源头。围绕经典文本和典范诗人的争论，日本汉诗人建立起以《怀风藻》为中心，大津、大友二皇子为典范的诗史观念。

细川十洲的《梧园诗话》在卷首讨论了日本诗赋之始的相关争议：《怀风藻》的作者是谁：大津皇子、大友皇子，还是淡海三船？另外，大津、大友两皇子谁才是日本的诗赋之祖？实际上，前一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日本汉诗发展史，145）。而对于后一个问题，细川当时搜罗的观点中，《日本书纪》、《古今和歌集》、《古今著闻集》等著作认为大津皇子是本国诗赋的开始，而这一观点被古人广泛接受。但是《怀风藻》则载录大友皇子所作汉诗。《今昔物语》的观点则与《怀风藻》相同。

作者关注到了两种观点的差异，认为：“想二皇子虽有前後，大抵同時，俱好文學能詩賦，易致混淆，故有此二说已。”（4946）而除了这两种主流的观点，还有观点认为：“又按《朝野群載》載《詩境記》，謂我朝詩賦起於弘仁承和，則不知前此有二皇子也。”

可以看到，有关本邦诗赋之始的观点冲突，展现了当时的诗话作者，已经有意识地思考本国诗歌史中的里程碑事件和典范诗人。

而关于日本诗赋之始的讨论，《诗法详论》则倾向于大友皇子：“按弘文帝述懷之御製，我國作詩之始也。爾來朝野争賦詩，而白氏之體尤行於世，觀江菅諸家之詩而可知也。蓋當時往來唐山，禮樂文物往往摸傚焉，勢不得不然。”（4833）

除此以外，作者在这里还讨论了日本汉诗发轫时期的诗风，即对白居易诗的效仿。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认为，由于日本和唐朝交通往来，日本在礼乐文化等等方面受到对方全方面的影响，因此赋诗在日本贵族阶级的流行是大势所趋。从作者对平安时期日本诗风，乃至文化风气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时作为汉诗创作主体的贵族阶级，其对赋诗的热情，是包摄于日本对唐代仪礼制度的全面模仿上的。

\*\*\*\*\*\* 诗史发展的展开

也有诗人对本国汉诗传统的发展历程作了梳理，其中可见其分期意识。

中井竹山认为，平安、江户时期是日本汉诗发展中的两个高峰，而自五山至江户的近五百年时间，可说是日本汉诗发展的低谷，所谓“聲詩之道墜在浮屠氏”（1006）具体来说，平安时代的高峰地位是因为日中两国的往来，使得日本得以输入大量的唐代诗歌。至于江户时代，则是因为德川幕府主政，全国政局稳定，亦重文教。

细川十洲则论《怀风藻》到五山时期的汉诗风尚：“本邦古詩，如懷風藻所載，氣象敦樸，有西土漢魏六朝之風。及白詩傳于我，則上下靡然以此爲宗,不獨菅家也。北條氏時，禪僧與西土人相往來，而五山之僧好誦《联珠诗格》《律髓》《三体诗》。”（4947）总的来说，细川对本国汉诗传统的描述，强调中国诗歌的影响，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每一次诗风变化都是因为中国诗歌、诗学文本被受容的体现。

信夫恕軒则将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开四败”（明治诗话，5005）。具体来说，他描述了从平安，到五山，再到江户、明治的发展过程。同中井竹山一样，他也否定五山时期汉诗的价值。同时，他也观察到本国汉诗创作主体的变化：从公卿到僧侣，再到士人、儒者、农民商人，最后再到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平民。可以看到，与汉诗发展历程同步的是，汉诗创作主体范围的扩大。可以认为，到了明治时期，汉诗的创作逐渐成为了一项全民性的活动。然而，作者并因此认为日本汉诗的价值也随之提高。他指出了日本汉诗发展到当时的两个缺憾：一是缺乏长篇的创作；二是剽窃模拟，缺乏创新，视野局限在近体诗中。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汉诗表面的兴盛和内部创新活力的缺乏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这些汉诗人对本国汉诗发展历程的分期，大致与当前学界对日本汉诗史的主流看法相当。此外，他们也注意到区分本国诗人的不同身份，并以至为一条描述日本汉诗发展的线索。而这种对诗人身份的关注在《日本诗史》中已经有所体现。其卷二专论江户时期之前不同身份的诗人，具体分为武家、隐士、医者、僧侣和闺阁。

\*\*\*\*\*\* 典范诗人的树立 - 和分期的关系是什么？

而在早期汉诗总集的编撰中，强调诗人身份的意识已经存在。如《怀风藻·序》：“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巻。作者六十四人。具題姓名，并显爵里，冠于篇首。”《凌云集·序》：“依爵次……作者二十三人，詩總九十首，合為一卷。”《经国集·序》：“作者百七十八人……人以爵分，文以類聚。”（小島之氏『国風暗黑時代文学』）在这些汉诗集中，除天皇、皇子以外，编撰者会写明每个诗人的官爵和姓名。只是王朝时代的日本汉诗人从职业、阶层来看主要集中在贵族和公卿，因此其分类不如江户时代丰富。

那么，对诗人身份的关注和对日本汉诗传统的分期意识有什么关系？有两点。第一，日本汉文学史的书写中，以各阶段创作主体身份的转移为分期依据是一种主流。这种分期依据同样适用于日本汉诗史，因为这种分期依据的背后，是汉文作为一种知识教养，由于各种因素不断转移和扩大的过程，而汉诗的发展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

其次，对诗人身份的关注，意味着对日本汉诗传统的构建是以作者而非文本为中心的。这些诗人在日本汉诗史中的典范地位也因此得到确认。

\*\*\*\*\*\*\* 用人名的数量

在日本汉诗人的论诗著作中，常可见到列举典范诗人的做法。

森如云在论本国汉诗发展历史时，就总结了各个阶段的典范诗人：如中古，有菅原道真、小野篁夫、大江匡房等人；五山，则有虎关师练、中津绝海等人。至于江户时代，有名诗人更是不可尽数。藤原惺窩、石川丈山、伊藤仁齋、木下順庵等儒学者及其门人，主持了享保正德年间的诗风发展。而到文化年间，则有賴山陽、梁川星嚴、廣瀨淡窗等汉诗人。其笔触虽不及《日本诗史》那样广泛，但其论述聚焦在诗学上，因此对于日本汉诗发展历程的勾勒还是简洁有力的。冢田大峰对本邦诗家的介绍则偏重于天皇、公卿、武家大名。在他看来，这些诗人的风格或精练，或有风雅之趣，皆是本国汉诗的代表。（1458）

大田淳轩则是用详细的名录说明本国赋诗的悠久历史。以下试举一部分：“而营公菅文時，大江匡衡、大江以言、三善清行、藤原冬嗣、藤原兼良、藤原賴長、藤原伊周、都良香、源順、源經信等諸臣，亦皆相争賦詩。當時作詩之盛可概見矣。”（5164）由此，作者认为本国可以称得上为“诗国”。从其论述看，所谓“诗国”，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悠久的赋诗历史；二是有蔚为可观的创作群体。作者略于诗风的描述，而详于诗人姓名的排列，实际上是将这些姓名作为构建本国汉诗传统的符号。

\*\*\*\*\*\*\* 诗人内部的比较 - 本国汉诗传统的建立

西岛兰溪以诗人对本国汉诗传统的构建，则是通过本国诗人在诗的意象和主题上的创造、传承为起点展开的。西岛兰溪沿用了皎然《诗式》中“三偷”的说法，认为“偷其語者爲之下”（2562）。其后，他例举了祇園南海、江村北海诗句中和新井白石意象和主题相似的诗：

“君不見東家阿嫗年七十,夜來向市買燕脂。”（白石）

“東鄰妖嫗尚效顰，夜買燕脂佩鸡舌。”（南海）

“歸意蘼蕪绿，離情芍藥红。”（白石）

“離情寂寞蘼蕪綠，愁心生憎芍藥紅。”（北海）

此处可以同《作诗质的》对“三偷”的发挥作类比。冢田大峰以“三偷”为切入口，考察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唐人則偷之於六朝以上古人,往往有徵之者。又盛唐以下，則有偷之於初唐者。……明七子联句，多窃句势于唐人律调。”

由此可见，“三偷”这一说法，是在同一诗歌传统中，考察不同阶段诗人诗作，在语、意、势三个方面与前人的关系。于是，一个互文的诗歌传统就被构建了出来，每一个阶段的诗人才得以在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此，西岛兰溪对南海、北海、白石三人诗句的考察，其意义也就不仅局限在相似之处了。更重要的是，此处对三者语、意、势的观察，是在日本汉诗传统内部进行的。这意味着，尽管《弊帚诗话》并非像《作诗质的》那样，从一个相对成熟、完整的诗歌发展过程中入手，但它体现出了对日本民族文学意象和主题的重视，以及对区别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日本汉诗传统的关注。

\*\*\*\* 现有日本汉诗史的分期方式

\*\*\*\*\* 日本诗史

:LOGBOOK:

CLOCK: [2020-12-21 Mon 14:10]--[2020-12-21 Mon 15:10] => 1:00

:END:

从凡例中可以看到，江村北海撰写《日本诗史》时，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元和以后，即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汉诗。尽管如此，《日本诗史》的第一卷涉及到所谓“中古近古”的汉诗。此卷也是现存较早的对日本汉诗发轫期文献、主要作者进行系统梳理的文本。

《日本诗史》的体例并不像文学史那样结构分明，并非全然按照日本政治史或文化史的推进来进行的。相对地，该书以日本汉诗人为主轴展开。卷二有云：“五山禪林之詩，固不易論也。蓋古昔文學盛於弘仁天曆，夷於延久寬治，泯沒於保元延久平治。於是世所謂五山禪林之文學代興。亦氣運盛衰之大限也。”（24）由此可见江村北海将江户之前的本国汉诗传统分为四个阶段。结合平治之乱等历史事件，可以认为江村北海也在政治之治乱的框架下讨论本国汉诗的兴盛衰落。

在《日本诗史》的分期中，中古近古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时期便是五山时期：“於是世所謂五山禅林之文學代興，亦氣運盛衰之大限也。”（卷三）也就是说，在江村北海看来，五山时期是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谷。从其所选择详细论述的作者数量看，绝海中津和义堂中信二人尽管诗才卓越，但这一时期的整体创作风气不能与前一个时段相比。而这一时期之所以“五山”为名，是因为幕府的扶持，使得五山寺庙、僧侣集中了大量的物质和文化资源：“於是凡海内談詩者，唯五山是仰。”（卷三）从中可以看到五山在当时的地位。

五山之后便进入德川幕府的统治。江村北海本人生活在江户中期，又为当时大儒，又与当时汉诗人多往来，所以对这段时期的汉诗情况着墨甚多。而对这一阶段，江村北海并未再以时间顺序对其再作整理，而是转换以空间的维度，对京都、江户及其他令制国地区的汉诗人、汉诗作品进行整理。

\*\*\*\*\*\* 总结

总的来说，《日本诗史》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诗话著作，以诗人为主体展开，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分期意识。同时，本书中已经能看到“中古”、“近古”等时间标志，呈现了江村北海对本国汉诗传统的整理意识。

\*\*\*\*\* 日本汉诗史

菅谷军次郎的《日本汉诗史》，其分期按照日本政治史的发展，从奈良朝时代写起，再到平安朝、镰仓幕府时代、室町幕府时代、江户幕府时代，最终以明治时代告终。

具体来说，每个部分的关键人物、重要事件和特点如下：

奈良朝时代以前。天智天皇时期，百济博士传来儒家经典。从诗风上来说，受到了六朝和初唐诗歌的华丽风格。

奈良朝时代。和铜三年三月，元明天皇迁都奈良，直到光仁天皇，共计七十五年。这一时期的诗风同上一个阶段没有多大变化，但七言诗的创作增多了。

平安朝时代。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迁都平安京，直到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这一时期围绕汉诗创作展开的游戏、诗会等活动成为主流，诗的风格也带有游戏的色彩。

镰仓幕府时代。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兴盛，尤其是禅宗。汉诗的创作较上个阶段更加衰减。整体的诗风，尚宋诗、《三体诗》。

室町幕府时代。这一时期被认为是文教衰败的时代。足利学校和寺子屋在战乱中保存了日本的文脉。

江户幕府时代。应仁之乱被平定，德川幕府统一天下，复兴了日本的文教。

这种分期方式背后的文学史观，实际是将日本汉诗的发展统摄在“政治-文教-文学”的框架中。在《日本汉诗史》中可以看到，它的分期是以日本政治史的重大事件为依据。此外，它的分期中还包括日中两国文化往来的重要事件，如遣唐使、禅宗输入日本等。而每个阶段执政者对文教的重视与否，乃至政策等等，都规约了汉诗的发展。总的来说，《日本汉诗史》在分期上强调与汉诗创作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背景，没有树立日本汉诗发展的自身脉络。

\*\*\*\*\* 日本汉诗发展史

在《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三章，作者专门讨论了日本汉诗的分期问题。

首先，作者对冈田正之和吉田学轩两位学者的分期方式作了评述（56-58）。这两位学者分期方式的共同点在于，以创作主体身份的变化为主要线索，试图勾勒出日本汉诗演进的面貌。针对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作者认为其缺憾在于书写不完备；对于吉田学轩的《平安朝时代的诗》，作者则指出其分期的标目修辞整饬，但逻辑不严。

从作者的评述中可以发现日本汉诗史发展的一种重要面向：

在日本汉诗史的演进过程中，作者群体身份的几次转变是很明显的，并且可以作为考察某个时期日本汉诗审美特点的重要切入口。

那么，作者自己在书写日本汉诗史时，所采用的是哪一种分期？作者认可了猪口笃志以时序为标目的分期方法，将日本汉诗分为发轫期的王朝时代、嬗变期的五山时代、成熟期的江户时代和衰替期的维新时代（59）。

单单从作者的标目来看，被称为“嬗变期”的五山时期应是受到尤其关注的。因为这一时期处在日本汉诗从发轫到成熟之间，对“嬗变”的观察或许可以窥见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中强烈的民族风格形成之前的迹象，继而有助于从整体把握日本汉诗的演进逻辑。然而，作者对“嬗变”却别有解释：“如果说王朝时代的汉诗较近“唐风”的话,那么,五山时代的汉诗则渐具“宋调”。这不能不说是随着世移世迁而发生的大嬗变。被奉为偶像、备受崇尚与模仿的人物已经不再是白居易,而变成了北宋诗坛的巨擘苏轼、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以及宋人最为折服的诗圣杜甫。”（63）

可见，此处所谓“嬗变”，指的是日本汉诗风格的变化。而这变化是以日本汉诗人师法之对象为原点提出的。

诚然，随着师法对象的不同，各个时期的诗风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正如《日本汉诗史》中所叙述的那样，日本汉诗人的模仿对象经历了长时段的变化：从《毛诗》、《文选》，到白居易、韩愈、黄庭坚，再到性灵派诗学，而这些诗人、诗作乃至诗学思想，都对日本汉诗诗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单将对中国诗坛的学习视作日本汉诗嬗变的原因，那么日本汉诗就仅是中国诗坛的延伸，其内部的演进逻辑被悬置了。

其后，作者总结道：“而五山时代的诗人固也致力于模仿,但不仅其模仿的水准要高出一筹,以致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而且也常常能独出机杼,变化生新。一句话,已从机械模仿的状态中蝉蜕出来。”（64）

在这里，“嬗变”意味着日本汉诗人师法水平的提高——他们可以充分理解宋诗的风格，以至精神。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日本汉诗有了新的风格。这里的“变化生新”可以认为是与中国诗坛相区别的部分。五山汉诗的文学史意义于是呼之欲出：从这一阶段开始，日本汉诗的民族特色首次被承认了。如此一来，江户时代对本民族特有风情的张扬，是继承了五山时期的创作遗产，因而被视为日本汉诗的成熟和繁荣期，可以说是符合作者的汉诗史构建的。

然而，从日本汉诗史的全局着手，我们不免疑问：什么样的“和臭”是可以被文学史承认的，抑或是有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的；什么样的“和臭”是对中国诗坛“笨拙”、“机械”模仿的结果？作出如此划分和判断的依据又在哪里？

从本书的叙述来看，王朝时代的汉诗被视作机械模仿，原因在于其内容多是应制，少有针对现实，或直抒胸臆的主题（61）。而本书的汉诗史观倾向于肯定日本王朝时代汉诗中抒情言志，符合“兴观群怨”的诗学品格的作品（24）。而这种价值判断是统摄全书的。比如，作者对奈良朝时期的宴游之诗评价不高，认为其“为文而造情”（98）。相反，平安朝前期那些体现着“文章经国”思想的现实主义作品则获得了较高的评价（118）。到平安朝后期汉诗总集《本朝丽藻》时，作者也强调日本汉诗人对汉诗讽喻和批判作用的忽视（272）。而五山时期的汉诗被认为有新意，主要是因为题材丰富，名家甚多（65）。

此外，这种汉诗观也决定了菅原道真成为本书最核心的典范作者。作者认为《菅家文草》与《菅家后草》两部诗文集中，写他人之未写，抒个人之真情的诗才是菅原道真有价值的诗学遗产。而为了说明菅原道真抒情诗的价值，作者在菅原道真的生平上铺陈了大量的笔墨。从其少年神通，到谪守地方，再到重返台阁，最后因小人谗言悲愤而终，菅原道真的个人经历可谓曲折。而作者尤其注意到人生的苦难对诗人的造就：“五年的谪居生活,使道真由诗臣进化为诗人”（325）

\*\*\*\*\*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中的“日本汉诗的近世流变”一章，主要梳理了江户时期的日本汉诗发展史。江户时代的日本汉文学在整个日本汉文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更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支。

由于研究对象集中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作者并未从整体上对日本汉诗史的分期作展开，而是将研究视野聚焦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发展史上，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剖析了近世日本汉诗史。

作者系统总结了中日学界对江户时代日本汉诗史分期的两种主流意见：三分法和四分法。其中，三分法描述了在该时期日本汉诗由尊唐到性灵的转向，而转向性灵之后，又有师法宋诗到学习清诗的变化；而四分法相对于三分法，更具体地阐述了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主题和师法对象的变化。可以认为，四分法是三分法基础上的延伸。

而作者的分期方式，则首先关注到江户时代日本汉诗较长的繁荣期（1680-1829）。然后以此为中心，作者将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分为三期：繁荣期之前的为发展期（1603-1679），其后的为总结期（1680-1829）。（312）

作者分期方式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作者尽管聚焦江户汉诗，但并未脱离对日本汉诗史的整体观照。不论是发展期还是总结期，作者都注意到它们在日本汉诗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其次，作者的分期方式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江户汉诗繁荣期的诗风、诗学的特点和转向。由于学界普遍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是日本汉诗史发展的最高峰，而作者对江户汉诗之繁荣期特点的突出，实际也是对从奈良平安时代以来，日本汉诗史整体的艺术巅峰的显现。

\*\*\*\*\* 总结

现有的日本汉诗史在书写的时间范围上有所不同，以下试分通史和断代史两类写法分别讨论它们在分期意识上的共同点。首先是《日本诗史》和《日本汉诗史》。这两部著作在分期上都注意到汉诗发展与本国政治、文教状况的关系。因此，它们的分期都有着以政治之治、乱作为标准的意识。同时，两部著作都对五山时期的汉诗评价较低，并都肯定德川幕府定天下、兴文教对本国汉诗发展的影响。其次是《日本汉诗发展史》和《近世东亚汉诗流变》。这两部著作分别选取了日本汉诗史中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阶段：汉诗发轫期的王朝时代与本土化特色显著的江户时代。它们对日本汉诗传统的分期，都强调描述某一阶段的日本汉诗人是如何受容中国诗歌和诗学思想的。